

中共党史

重大争议问题研究

罗平汉 卢毅 赵鹏◎著

Zhonggongdangshi Zhongda Zhengyi Wenti Yanjiu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

重大争议问题研究

罗平汉 卢毅 赵鹏◎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罗平汉,卢毅,赵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320-2

I. ①中… II. ①罗…②卢…③赵…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980 号

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

ZHONGGONG DANGSHI ZHONGDA ZHENGYI WENTI YANJIU

罗平汉 卢毅 赵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5

字数:468 千字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01-012320-2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著述。这些研究成果既涉及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几乎涵盖了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研究者占有的史料不同,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对中共党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或某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时,往往作出不同的评判,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不少争议问题。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些争议问题不但为学术界所关注,也往往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话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一些党史研究中的争议问题甚至成为网民议论的热点。本书试图对其中一些争议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并在进一步挖掘利用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再稍作研究。

本书拟就如下问题展开探讨:(一)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错误问题;(二)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三)延安整风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问题;(四)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问题;(五)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问题;(六)1957年全党整风与反右派运动问题;(七)“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问题;(八)“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问题;(九)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历史定位问题。自然,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重大问题,不但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在社会上也时常有所议论,由于作者的学识所限,本书暂未将其列入,留待以后进行研究。

本书写作并非对上述问题所发生的学术争鸣作出谁是谁非的

裁判,而是对上述问题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探讨,以期将上述历史事件及相关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下,进行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苛求前人,亦不以个人情感臧否历史,力求再现历史的真相,在叙说历史中尽量还原历史。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错误 / 1

- 一、传统观点的突破与颠覆 / 1
- 二、大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 / 8
- 三、工农运动“左”倾的原因 / 22
- 四、陈独秀的右倾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 38

第二章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56

- 一、是“共工”还是“蒋干” / 56
- 二、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 / 67
- 三、怎样看待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 78

第三章 延安整风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 / 92

- 一、众说纷纭的延安整风 / 92
-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延安整风 / 97
- 三、与王明交锋的两个回合 / 110
- 四、从整风转入审干 / 119
- 五、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 132

第四章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 143

- 一、从为地主“平反”说起 / 143
- 二、地主、富农的界定 / 147
- 三、旧中国土地是集中还是分散 / 153
- 四、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之因 / 161
- 五、土改过程中为何发生乱打乱杀 / 169
- 六、老解放区土改之意义 / 183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 / 194

- 一、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不同评价 / 194
- 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性质 / 201
-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 / 216
- 四、社会主义改造为何提前完成 / 229
- 五、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 235

第六章 1957 年全党整风与反右派运动 / 244

- 一、阴谋还是“阳谋” / 244
- 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 249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254
- 四、“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 262
- 五、“事情正在起变化” / 271
- 六、反右派运动的开展 / 280
- 七、错划右派的甄别、改正 / 295

第七章 “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 / 300

- 一、“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大跃进”时期 / 300
- 二、1959 年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 308
- 三、“三年暂时困难”的成因 / 336
- 四、“大跃进”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 / 351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 / 357

- 一、“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是“有所发展” / 357
- 二、“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 / 363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成就 / 379
- 四、如果看待“文革”十年经济建设的得失 / 387

第九章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历史定位 / 399

- 一、徘徊还是前进 / 399
- 二、粉碎“四人帮”的后续举措 / 406
- 三、“两个凡是”的提出 / 411
-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的“跃进” / 417
- 五、调整教育科学文艺政策 / 428
- 六、平反冤假错案 / 441
- 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449
- 八、改革开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酝酿 / 456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错误

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和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一度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这是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历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其自身力量也遭受了空前的重创。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解密,更是涌现出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说法。笔者拟着重围绕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加以介绍,并运用相关史料作一番评析。

一、传统观点的突破与颠覆

近年来,缘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和新材料的逐步发掘,党史界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突破了传统观点的局限,从许多新的视角和侧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层出不穷。^①这尤其反映在对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错误及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的研究中。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金冲及的《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唐宝林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奇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李颖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金果等人所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读解:中国大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等,均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1.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错误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主要是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所造成,放弃了革命领导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一点,早在1928年他就指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①1947年,他又详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②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亦持相同看法。于是,这便构成了长期以来党史论著的一个基本结论。

不过,也有人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与当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有关。1937年,刘少奇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他还说:“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③但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刘少奇的这一论断并未引起大家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开始对此加以重新审视,郑重提出:“实际上,这种‘左’倾错误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正视它和总结它”,并认为其危害主要是:首先,它影响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往往伤害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其次,“左”倾错误给反革命宣传以口实,使我们处于被动,扩大了敌人的营垒。^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4页。

④ 余世诚:《大革命时期的“左”倾》,《石油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因此,它“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又一个重要原因”^①。

具体分析起来,有学者指出,武汉政府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其恶果是不仅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发展,且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感,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造成共产党和工人、工会与士兵和农民、工人纠察队与市民之间的关系紧张。^②还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并不仅仅限于武汉政府时期,而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存在。它具体表现为:在处理民族矛盾时,注意反帝斗争的策略不够,盲目打击一切外国人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处理阶级矛盾时,不注意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工人改善经济待遇的要求越来越高,得不到满足就罢工、游行,对企业管理干涉过多;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工会的权力超过了群众组织应有的权限,出现了“以工代政”的倾向。^③

对于以上这种观点,也有人与之商榷,强调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远没有那么严重,也不是贯穿始终的,因此不能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错误说过头,只能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④还有学者提出:统一战线的破裂另有他因,“武汉民众运动过程中的左倾行为,并非导致联合战线破裂、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把武汉工人运动中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作为造成资产阶级经济困窘而背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似乎是很难成立的”。^⑤

至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予以大力褒扬的缘故,历来被视为正面典型。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

① 张纯:《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再探讨——谈“左”倾错误对大革命失败的影响》,《理论探讨》1999年第2期。

② 刘继增等:《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③ 黄艺农:《“一战”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倾向》,《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④ 曾宪林:《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有关问题之商榷》,《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期;程涛平:《怎样看待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⑤ 陈芳国:《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4期。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1986年,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便谈道:“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①此后,人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

一种观点赞同李维汉的意见,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中存在不少“左”的偏差和错误,不能因肯定其历史功绩而忽视乃至抹杀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一)部分地区农民协会领导分子不纯,自由主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二)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三)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一战线队伍急剧萎缩。(四)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运动被降格以求。^②尤其是“阻禁平粜”的开展,“影响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市民、军队的粮食供应”,“致使商人、军官和地方各界对此禁令深恶痛绝”,这无疑“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革命发展”。^③

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本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虽然出现过一些幼稚过火与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它不是本质和主流。^④特别是对“阻禁平粜”要作科学分析,不能一概否定。“阻禁平粜”是广大贫苦农民在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一项必然要求,其起因是垄断农村粮食流通的地主豪绅与买办商人推行的“闭粜高价”。“阻禁平粜”是把粮食的控制权从地主豪绅手中转移到贫苦农民手中,不仅从经济上打击了地主,而且在政治上揭露了地主豪绅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面目。但北伐开始后,“阻禁平粜”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对此,中共湖南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② 李彦宏:《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湘潭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③ 任全才:《关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之管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④ 范忠程:《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区委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在保证军粮需求的同时,实行了新的粮食分配办法和谷米流通制度。这样,既坚持了“阻禁平粜”的基本精神,又限制和克服了其消极作用。^①

在此期间,还有学者深入分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发生“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一)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理论上对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对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之间相互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二)在理论上偏颇,片面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因而对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采取容忍、迁就的态度,使“左”倾错误得以蔓延。(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工农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四)工农运动中阶级成分复杂,流氓无产者涌入工农运动,甚至在其中掌权,发号施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②

此外,还有学者详细梳理了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理论表现和发展过程,认为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源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于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的“左”倾思想达到了空前程度。在实践上,它导致了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严重的“左”倾错误,不断激化着联合战线中本已日趋复杂的矛盾。“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共同存在,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迅速失败。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③

2. 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开始指责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未

① 何世芬、姚金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阻禁平粜”要作科学分析》,《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6期。

② 任全才:《关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之管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③ 蔡文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

能执行莫斯科的“正确指示”，“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而“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正确性”^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也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未能经受住“火的洗礼”^②。斯大林、布哈林的这些论断为追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定了调子，从而将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推上了被告席。从此，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就背上了“机会主义”的罪名。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机会主义”逐渐变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后又变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皆以陈独秀个人冠名。1937年，毛泽东就说过：“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到了1939年，他又说：“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③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④此后，这种说法长期沿用下来，包括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内的很多党史论著都遵循了这一说法。就这样，陈独秀便成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陈独秀的责任问题进行了大胆探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档案资料 and 回忆录的分析，认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或者是以陈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10页。

②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50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6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954页。

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都是不公正的。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下进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它们决定后在中国实施的,所以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应当由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来负,陈独秀只不过是出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罢了。^①

研究者指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失误,因而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说来,从1923年至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②事实证明,所谓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的直接指导下做出的。陈独秀起草的那份备受非议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也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错误指导的结果,一些右倾退让的决定更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直接做出的。^③相反,陈独秀的许多正确主张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采纳。因此,“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以前加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应该摘掉”^④。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也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把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那时候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⑤

作为官方的中共党史权威读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在讲到向国民党妥

① 李雅莉:《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的责任》,《传承》2010年第9期。

② 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苏杭:《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⑤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8页。

协退让问题时,该书又说:“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①这就鲜明地指出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方针,是共产国际制定并强加于中共中央的。同时,这部新党史在表述过去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三大错误时,都没有点陈独秀的名,而均代之以“中共中央”,说明是中央集体的决定,集体负责,不着重于追究陈独秀的个人责任。这些观点相比较于传统说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一时期,还有研究者对陈独秀错误的性质做出了新的分析,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所犯的错误的,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犯的错误的,这些错误不具备“投降”的性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也没有投降的动机和行为,因此称其“右倾投降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宜再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吸收了这种意见,将“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②但有学者又进一步指出,无论称其为“右倾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不恰当的,把陈独秀所犯错误表述为“右倾退让错误”比较适合。^③

总之,近些年来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以往观点大不相同。其间的是非曲直以及究竟如何评判,显然值得深刻总结。

二、大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右倾错误,而对“左”倾错误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9—20页。

② 姚金果:《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定性的历史回顾》,《百年潮》2003年第6期。

③ 李颖:《陈独秀大革命时期错误定性表述问题辨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